

清水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防灾火灾知识及其价值

龙秋香 吴彪 曹端波

怀化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南省怀化市，418000；

摘要：梳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传统防火知识，挖掘地方性知识。对探究清水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传统防灾减灾体系在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中是如何发挥效能的，以及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水江；苗族村寨；木构家屋；防灾火灾

DOI：10.69979/3029-2727.24.05.031

1 问题的提出

清水江流域苗族吊脚楼是我国木质结构建筑的组成部分。苗寨依山而建，木房鳞次栉比，与山高林密的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村寨之中簇拥紧密的木楼，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既是苗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

木质房屋具有一个弱点——耐火性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平日，我们偶尔看到有新闻报道了某某村寨失火，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些火灾事故的发生，是当地人缺乏防范和应对火险的知识和经验，防范化解火灾体系效能不高，还是因为媒体的发达和网络手段的丰富，使得我们的视觉受到冲击，加重了我们的危机感？或者说，苗族原有的防火体系失去了效能，才致使当前的火灾屡屡发生？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2.1 有关灾害的民族学研究

灾害研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有关灾害的民族学研究历程，是从过去相关灾害内容散见于各类民族志之中逐渐转变到现今的灾害专题、跨学科比较研究，内容侧重于与人类社会文化相关联的视角分析，以及民族志的呈现，涉及致灾因素、灾前预防、灾时救治、灾害影响、灾害善后及汲取教训等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 Pritchard）、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长期以来，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灾祸时，往往将引发灾害的原因归于“天降惩罚”、巫术咒语等超自然因素，这其中需要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来祛祸以求福。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关于灾害的民族学研究文献繁多，内容丰富，专题

化研究显现，跨学科比较研究视角突出，研究者探索了有关灾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强调与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整体性分析视角。例如，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纳日碧力戈、庄孔韶等从研究范式和取向上探讨社会文化的防灾减灾功能，扎曼（M. Q. Zaman）、张曦、李永祥等从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上讨论灾害与当地社会文化的关系，包括致灾因子的社会文化属性、防灾减灾的地方知识以及应对灾害的社会文化机制等内容，成为当前民族学研究灾害的热点和趋势。

2.2 对火灾的民族学研究

有关火灾的研究，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均有涉及。民族学界关于火灾的研究，侧重于民族与“火文化”的关系，即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用火中所赋予的社会文化内涵。弗雷泽在《金枝》（2010）中描述斯拉夫各民族为了预防火灾，把燃烧的木头从篝火中抽出一些保存于屋内，用它来抵御另外一种“火”（火精）的侵害，或者避免受到巫术的骚扰。张海洋（2007）认为，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社会底边群体成为社会冲突热点、火灾受害焦点和消防工作难点，呼吁通过解读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可以在基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来构筑社会公平防火墙，把民族火文化融入消防改革之中。在防范举措上，应该“两手抓”，即“抓人员和装备的优化配备”和“中国消防经验的总结和推广，特别是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的重建与传承”。郑晓云（2007）认为，火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虽然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其中很多内容已消失或发生变化，但对于当代的消防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预防火灾具有积极的作用。可知，民族文化中富含了各种预防和应对火灾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没有因为社会文化变迁而丧失功能，至今仍然行之有效，而苗族传统防

减火灾知识体系也应是如此。

2.3 关于苗寨火灾的相关研究

民族学界对苗族地区防减火灾相关研究,文献量大,内容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视角等特点。相关民族志作品的叙述中,费孝通等著《贵州苗族调查资料》(2009)在叙述苗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寨老制、立石制、“不成文”的习惯法等和农副业生产禁忌、生活禁忌等风俗时,指出其具有社会文化控制的功能,包括火险防控与应对。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2009)记叙了从江县加勉乡、雷山县掌批村苗族社会文化,从习惯法、风俗禁忌、生活习俗等方面综合阐述了预防和应对火灾的措施。基于苗族习惯法视角探讨火灾方面,徐晓光(2006)认为每个苗族村落都有“防火公约”或“村规民约”,林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农事用火以及对痴呆、弱智、精神病人、儿童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等。周相卿(2008)在分析苗族村寨的防火制度及其问题时,认为仅仅依靠国家法律,难以满足当地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苗族传统“习惯法”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在苗族宗教信仰及仪式活动讨论防范和应对火险方面,万必轩(1996)认为长期居住在山地苗族对其寨子的安全特别重视,尤其防火,因而有些苗寨每年(有的苗寨需数年)需举行一次“洗寨”活动,以求平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提到,“退火央”(苗语称“勒下”),是苗族预防火灾之巫术,其仪式过程旨在祈“火央鬼”离寨,以达到预防火灾之作用。麻勇恒、范生姣认为苗族“洗寨”仪式是调用神圣与世俗的力量化解社区成员矛盾的活动,既能够强化苗族传统“习惯法”的公正与威严,又可以使防范“火殃”、崇敬“火神”以“社区指令”的形式潜移默化于群体成员的意识之中,进而实现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个体行为的规范性内化约束,减少社区消防安全隐患。在对苗族村落或山林火灾的发生原因上,吴一文、覃东平等在《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2000)提到,放火行为主要是指烧寨和烧山林,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苗族地区多为林区,火灾损失大。房屋多为木质结构,各家各户首尾相连,一户失火,可能殃及全寨,所以对此处理极其严厉。吴大华、郭婧(2013)认为,农村火灾多发就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根源,如经济欠发达地区消防工作缺乏资金支持、木质结构建筑或茅草房居多、水源先天缺乏、用火方式落后等。在讨论

苗族在失火救援及其赔偿上,徐晓光(2014)在其书中记述到相关“村规民约”及“防火公约”的内容,从村寨火灾和山林火灾上规定罚款金额、赔偿物资、追究刑事责任等,对苗族村寨的防控火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文婷等(2015)从法学的角度呈现了以西江村为个案的苗族防火制度,包括“逐户防火安全检查制”、“十户联防”和“应急救火策略”等,认为在预防和应对火灾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使提到了当地苗族社会文化的防减火灾功能,但没有过多讨论,而是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及其效能。

就苗族预防和应对火灾的研究现状而言,可分归为四类:从文本形式上,在著作方面,主要散见于各类民族志作品和地方志之中;在论文方面,主要从某一文化事象阐释防火功能和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耦合关系的预防办法进行探讨。从研究内容上,主要从历史记载、习惯法、宗教信仰、引发火灾的原因、失火及救援工作等方面进行讨论。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从苗族社会文化的某一文化事象及其功能讨论防火。在研究问题上,大多学者主要以苗族文化“发展”为中心,而忽视了苗族发展中的保障功能,即预防和应对灾害的文化。基于上述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和加强的薄弱环节:(1)忽视了预防火灾与苗族生产生活实践整体相关联,尤其“以人”为中心的视角;(2)过于注重研究预防火灾的技术性预防措施,忽略了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即预防火灾的地方性民间知识;(3)缺乏讨论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系。

3 田野点介绍

清水江流域苗族村民延续了中部苗族方言区所擅长的以水稻种植为主、家禽家畜养殖为辅的复合型生计系统,采取“一年二熟”的耕作模式,即春收油菜籽粒、秋收稻谷和玉米,男女分工明确,农忙、闲时节明显。

当地家屋以干栏式木质结构建筑为主,建造于河坝耕地或者山腰陡坡上,高度在1.6-1.8丈左右,也有高达2丈多的和低至1.5丈的房屋。常见的民居样式,有“凹口式”和“平口式”二种,分别是22根和20根柱子,墙体是由5-8块不等的木板组成的1块墙体,由2根插削固定,均为四排柱、三开间。屋内正中开间为堂屋,两侧各开间分成4小间,用作卧室和厨房,也有人家另建偏旁作厨房或灶房。厨房内设火坑及堆放柴禾处、

灶台、厨柜等，摆有一个大水缸、两只水桶以及其他烧火做饭的炊具。火坑里有三脚铁（砂）质架，常常放上一个烧水壶。在火塘之上，设有（自下而上）晒簋、晒台和晒簋。晒簋，用竹或木板制作而成，高于三角铁架 150 厘米左右，用作烘烤如豆腐、辣椒等干货。晒台，高于晒簋 50 厘米左右，用于烟熏腊肉。晒楼，即厨房的楼顶，用数根木柱搭建而成，高于晒台约 30 厘米，既有利于火坑里燃烧柴禾所产生烟气的排放，又可存放稻谷、玉米、辣椒、烟叶等，通过常年烘烤以防潮。

4 传统防灾火灾知识研究方案

梳理清水江流域苗族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阐明这套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在苗族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的效能及其及其形成过程、逻辑和价值，包括其传承和变迁的过程；分析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系。

1. 清水江苗族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对清水江流域苗族的来源、分布、生存环境、资源条件和田野点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习俗信仰等进行了介绍。

2. 苗族村寨传统防范火灾知识体系。从古歌、谚语、俗语、禁忌、仪式、教育、行为规范（包括乡规民约）等方面，整体呈现田野点苗族居民有关火和火险危害的地方性知识。发掘整理当地村民烧山、垦荒、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和家庭用火、仪式活动等日常生活的用火、防火、救火的知识、习俗、规范和观念，以及村民应对火灾隐患的防控知识和措施，分析这些知识、习俗、规范、观念和举措是如何进行代际传递，并转化成个体和社群的能力的。

3. 苗族失火及其善后的案例分析。关注村民是如何总结、汲取、传承相关的经验与教训，提高整个社群对火灾隐患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的。

4. 苗族传统防火知识的变迁及其影响。分析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作为防控火险主力军的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生产生活的电气化，使乡村社区防范火灾的

传统手段效能弱化、对新火警火源知识缺乏和防范手段匮乏所引发的新问题，并探讨和总结应对之策。

5. 防减火灾与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讨论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之间的关系，旨在长期居住在一个区域的人民，是否存在彼此合作、共同管理，开展了村与村、寨与寨和人与人联防的机制，以防减火灾知识体系为纽带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出区域和谐并进的社会秩序。

应对火灾的传统社会文化机制并未因“失败”而失去效能，而是需要与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新手段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增强社区抗御火险的能力。苗族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不仅仅是个体在防范及应对火险方面掌握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还是一村一寨的防减火患文化体系。由于火灾发生具有突发性，重大火灾对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带有毁灭性，并且火情还有快速蔓延的危险性，因此彼此相邻的若干村寨必须守望相助、休戚与共，从而形成了区域命运共同体。

5 讨论

当地居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防范火险的社会文化机制，有效地保护了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苗族传统防减火灾知识体系不仅仅是个体在防范及应对火险方面掌握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还是一村一寨的防减火患文化体系。同时，事实上，由于火灾发生具有突发性，重大火灾对人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带有毁灭性，并且火情还有快速蔓延的危险性，因此彼此相邻的若干村寨必须守望相助、休戚与共，从而形成了区域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M]. 赵阳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2]罗康隆. 传统知识与生态灾变救治[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第 S2 期.